

Kun Jing yu Chao Yue

困境与超越

——宋代文人心态史

Song Dai Wen Ren Xin Tai Shi

马茂军 张海沙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經過一段的悲歌與吶喊，經過一段的休養生息，
文學重建的歷史課題又一次推到了南宋文人的面前。
南宋的文學大家與北宋的文學大家所相同的是，
他們都有繁榮的前代文學即唐代文學作為參照，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文學。
而南宋文人與北宋文人所不同的是，
南宋文人更有一份參照物，那就是北宋文人繼唐代之後的探索與創造。



北宋文人在繼承與革新的文學歷程中，留下了輝煌的成果，也留下了偏頗的足跡。
這是南宋文人必須清理、發掘的遺產。
也是南宋文人必須超越的峰壘。
南宋文人與北宋文人在歷史處境方面的另一不同是，
作為南宋偏安小朝廷的文人，他們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脅及外侮的耻辱。
因此，在對文學的思考中，會帶上更為濃郁的社會政治內容的色彩。



以南宋“中興四大詩人”作為南宋文學建設者的代表進行文學建設心態的綜合考察，
可以看到，他們在創作上盡管面目各異，風格多樣，
但他們却關注過、熱衷討論過同樣的問題。
對這些問題，他們也提出過十分接近的觀點。
這些集中的問題是：文學發展的通與變，
文學創作中法與非法的問題以及文學與生活的關係。



困境与超越

——宋代文人心态史

马茂军 张海沙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困境与超越:宋代文人心态史/马茂军,张海沙著. -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.5

(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/陈桐生,刘怀荣主编)

ISBN 7-5434-4162-4

I. 困… II. ①马…②张… III. 知识分子-研究-中国-宋代 IV. 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178 号

书 名	困境与超越——宋代文人心态史
作 者	马茂军 张海沙
责任编辑	郝建国
封面设计	刘 昕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	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)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5.75
字 数	214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4162-4/D·29
定 价	20.4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北宋文人心态（上）	[1]
一 佑文政策	[1]
二 入宋宰执	[4]
三 入宋文士	[11]
四 山林逸士	[17]
五 循默文臣	[53]
六 丁谓之奸	[58]
七 对循默的反动	[62]
第二章 北宋文人心态（中）	[66]
一 师道尊严	[66]
二 庆历士人	[79]
第三章 北宋文人心态（下）	[118]
一 尚统	[118]
二 道统	[120]
三 文统与诗统	[122]
四 尚党	[129]
五 晋宋风韵	[139]
六 尚博	[145]
七 诗社	[149]

第四章 南宋文人心态（上）	[164]
一 靖康事变，从容赴难	[164]
二 慷慨言兵	[175]
第五章 南宋文人心态（中）	[190]
一 文学建设	[190]
二 思想建设	[208]
三 直把杭州作汴州	[227]
第六章 南宋文人心态（下）	[242]

第一章 北宋文人心态（上）

一 佑文政策

北宋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，政治宽松，生活优裕。北宋又是古代文人的成熟期，文人的心理、心态成熟于这期。而这一切又与宋王朝的佑文政策是分不开的。

北宋的佑文始于太祖，形成了所谓的“祖宗家法”，且有著名的“三誓碑”一说：

艺祖受命之三年，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，谓之誓碑。用销金黄幔蔽之，门钥封闭甚严。因敕有司，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，谒庙礼毕，奏请恭读誓词。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，余皆远立。上至碑前，再拜跪瞻默诵讫，复再拜出。群臣近侍，皆不知所誓何事。自后列圣相承，皆踵故事。靖康之变，门皆洞开，人得纵观。碑高七八尺，阔四尺余，誓词三行，一云：“柴氏子孙，有罪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内赐尽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支属。”一云：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”一云：“子孙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。”后建炎间，曹勋自金回，太上寄语，祖宗誓碑在太庙，恐今天子不及知云。

2 困境与超越

(《避暑漫抄》)

太祖定下国策，列圣相承，成为家法。推太祖之意，是鉴于五代武人跋扈，军阀割据，而对部下大将心有疑忌。据《闻见近录》载：

太祖即位，方镇多偃蹇，所谓十兄弟者是也。上一日召诸方镇，授以弓箭，人驰一骑，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，下马酌酒。上语方镇曰：“此处无人，尔辈要做官家者，可杀我而为之。”方镇伏地战栗。上再三谕之，伏地不敢对。上曰：“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，尔辈当尽臣节，今后无复偃蹇。”方镇再拜呼万岁。

可见武将的兵权和跋扈实令靠政变起家的太祖心有余悸。终而有杯酒释兵权，罢武将兵权，行文官政治。

文官政治的背后，实是皇权的强化和作为武人的太祖内心里对文人的轻视。

太祖幸朱雀门，赵韩王从。上指门额问曰：“何不只书朱雀门，须著之字安用？”普对曰：“语助。”上笑曰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！”（《湘山野录》）

太祖尝曲宴，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，太祖以前朝学士，优容之，令扶以出。著不肯出，即移近屏风，掩袂痛哭，左右拽之而去。明日或奏曰：“王著逼宫门大恸，思念世宗。”太祖曰：“此酒徒也。在世宗幕府，吾所素谙。况一书生哭世宗，何能为也。”（《国老谈苑》）

作为一位大政治家，太祖可谓对文臣武将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深信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的古语，深擅驾御文人之道。据《程史》载：

三徐著名江左，皆以博洽闻，而骑省铉，又其岳岳者也。会修职贡，骑省实来，及境，例差官押伴，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悼。宰相亦难其选，请于艺祖。有顷，左珣宣传殿前司具殿侍不识字者十人进，以名入。宸笔点其一曰：“此人可。”在廷皆惊。殿侍者茫不知所由，弗获已，竟往。始燕，骑省词锋如云，傍观骇愕，其人不能答，徒唯唯。骑省叵测，聒而与之言，居数日，既无相酬者，骑省亦倦而嘿矣。

自唐以来，大臣见君，列坐殿上。艺祖即位之一日，宰执范质等犹坐，艺祖曰：“我目昏，可自持文书来看。”质等起呈罢，欲复位，已密令去其坐矣。遂为故事。（《邵氏闻见录》）

在这些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贵为君王的武夫对文人的轻视和恣意玩弄。在宋太祖身上我们看到了刘邦的影子，他们轻视文人的故事一样有名。

虽然如此，宋代却十分优待知识分子，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建设。这是宋王朝始终执行“重文轻武”、“兴文教，抑武事”这一方针政策的结果。宋代初年，已非常重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，宋代录取进士的人数往往比唐代增加数十倍，为士人提供了大量的仕进机会。同时皇帝还亲自“殿试”录取举子，以示恩宠。这是宋代网罗、笼络人才的特殊举措。

宋代还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。国子监下的国子学和太学非常有名。仁宗庆历四年，又下令地方大量兴办州学、县学。受此风影响，私人讲学的书院也纷纷建立，著名的有石鼓、岳麓、白鹿洞、应天、嵩阳等，讲学者为名儒硕学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。

宋王朝给士大夫以很高的政策待遇和优厚的俸禄。通过科举考试的文人，往往不数年便位至高第，“名卿巨公，皆由此选”，文官政治成为宋代一大特色。而宋王朝给予文官俸禄之厚，赏赐之多，也是前

代无法比拟的。“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。”^①

佑文政策、文官政治为宋代文人提供了最大的舞台，任其施展。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成熟期。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文人自觉意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感，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业绩，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二 入宋宰执

从类型的角度说，宋代文人有学者型、官僚型、道学型、诗人型等，而宋初文人有自然型、官僚型两种。

宋初文人承五代余习，战乱的魔剑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秩序和结构，也摧毁了文人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，崇高和理想在剑与火面前是那么苍白和无力。文明之火熄灭了。文人蜕化为一种使用文字的工具，文字成了一种纯粹的谋生手段，文人成为军阀的附庸，成了军府幕客。实力、军权、刀剑成了社会的主宰。文人们，有良知者隐于山林之间，大部分奔走于军府之间，看着频繁的朝代变化，用不同或相同的面孔去应对着更迭的君王。这些人物中，冯道可作代表。他历任数朝，全无一点忠君、节义的观念，可他在五代宋初却为人们所称道，称为善守之人。

宋初文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心理也未有改观，且看一下“太祖代周”的闹剧。

时主少国疑，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，都下谨言：“将以出军之日，册点检为天子。”士民恐怖，争为逃匿计，惟内廷晏然不知。癸卯，大军继出。军校苗训号知天文，见日下复有一日，黑光摩汤者久之，指示匡胤亲吏楚昭辅曰：“此天命也。”是夕，次陈桥驿。将士相聚谋曰：

^①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·宋制禄之厚》。

“主上幼弱，吾辈出死力破敌，谁则知之！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征，未晚也。”都押衙李处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掌书记赵普。匡义、普部分诸将环列待旦，遣牙队军使郭延赞驰骑入京，报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、都虞侯王审琦，二人皆素归心匡胤者。甲辰黎明，将士逼匡胤寝所，匡义、普入帐中白之。匡胤时被酒卧，欠伸徐起，将校已露刃列庭，曰：“诸将无主，愿册太尉为皇帝。”匡胤未及对，黄袍已加身矣。众即罗拜呼万岁，掖之上马，还汴。匡胤揽辔曰：“汝等贪富贵立我，能从我命则可，不然，我不能为若主矣。”皆下马曰：“愿受命！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一）

宋太祖陈桥兵变一出戏演得格外精彩，将叛乱演变为被逼迫上台，“黄袍加身”。然深思一步，更用心体察一些，你就能感受到陈桥兵变的深厚社会心理和必然性，五代之际，权力更迭频繁，非铁腕不足以控制政权与其说都下谏言“将以出军之日，册点检为天子”是宋太祖一伙的舆论准备，毋宁说是周世宗去世后形成的权力真空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和猜测。“主少国疑”，在用拳头说话的五代，逆乱者必然是军权在握的赵点检。变乱在即，“士民恐怖，争为逃匿计”。

从将士的角度而言，忠君的观念早已被置之脑后。他们看惯了皇位更迭，也愿意皇位更迭。每一次更迭都是他们升官进爵的好机会，所以，宋太祖说：“汝等贪富贵立我。”他正是抓住、利用了这种心理，佯装醉酒，糊涂而又清醒至极地黄袍加身，完成了兵变。

在自然界中，动物只是“食以生存”。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使人类超越了动物性的本能，而追求礼义、道德、集体利益等。五代战乱，礼义廉耻不存，无疑是文明的沦丧。

作为具有社会良心的文人，也未能表现出不事二主，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儒家精神。在将校的威逼下，“质等相顾不知所为，溥降阶先拜，质不得已亦拜”。无行文人陶穀更是早已拟好禅让诏书。于是“匡胤就廷，北面拜受，乃掖升殿，就皇帝位”，“遣使遍告郡国

藩镇，加官进爵有差”。全国皆大欢喜。

这场变乱中，可称忠直的只有四个军人。“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自禁中遑遽而归，谋帅众御之，军校王彦升逐焉。通驰入其第，未及合门，为彦升所害，妻子俱死。”^①“戊申，诏赠周马步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为中书令，以礼收葬，以旌其忠。”^②韩通是这次事变中惟一尽忠的将官。另据《玉照新志》载：“陈桥驿在陈桥、封邱二门之间。艺祖拥戴之初，陈桥守门者拒不纳，遂如封邱，抱关者望风启钥。逮及帝位，斩封邱而官陈桥者，以旌其忠所事。”另《随隐漫录》载：“太祖自陈桥驿拥兵入，入祇候班，陆、乔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，乃自北门入，陆、乔义不臣，自缢死。太祖亲至直舍叹曰：‘忠义孩儿！’赐庙曰忠义，易班曰孩儿。”叛逆而立的君王，最需要的是忠义，而宋初最缺的是忠义。为了旌扬忠义，太祖不惜褒奖政敌，与其说这是政治手段，毋宁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。这也是太祖重视教化的原因。

节行问题，在入宋宰执身上表现更为典型。

（一）范质

范质，在太祖朝的文人中，可谓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位。首先他是个文采飞扬的文人，世谓之得大文人和凝的衣钵。《宋史》本传称：“质力学强记，性明悟，举进士时，和凝以翰林学士典贡部，览质所试文字，重之。自以登第名在十三，亦以其数处之，贡闈中谓之传衣钵。”且传说，“质生之夕，母梦神人授以五色笔，九岁能属文，十三治尚书。”这支五色笔日后使范质名扬天下，文重四方。本传云：“诏令多出其手，吴中文士莫不惊伏。”文章能让擅长文采的吴中文人惊伏，可见辞采之胜。

生于乱世之中，光有文采尚不足。范质又是一个胸怀天下、满腹经纶的宰辅型人物，而不单单是一无用书生。他青年时即志向高远，本传称：“初质既登朝，犹手不释卷，人或劳之，质曰：‘有善相者谓我异日位宰辅，诚如其言，不学何术以处之！’”

^{①②} 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一。

从人格修养角度来看，本传有评曰：“质性下急，好面折人，以廉介自持，未尝受四方馈遗。前后所得禄赐，多给孤遗，闺门之中，食不异品，身没家无余赀。太祖因论辅相，谓侍臣曰：‘朕闻范质止有居第，不事生产，真宰相也！’太宗亦尝称之曰：‘宰辅中能循规矩、慎名器、持廉节，无出质右者。’”范质性格刚介，才华横溢，品格高尚，清正廉洁，备受二帝推崇。从个人人生道路而言，位极人臣，也可满足了。

但如果换一个角度，以宋中后期讲究忠孝节义的儒者眼光看，范质的大节又有亏。宋太祖在高度评价范质的清正廉洁后，又拖了一个尾巴说：“但欠世宗一死，为可惜尔。”周世宗对范质可谓知之、信之、重之。据《宋史》载，周世宗对范质曾有“解袍衣之”之恩。“汉初加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周祖征叛，每朝廷遣使斋诏，处分军事，皆合机宜，周祖问：‘谁为此辞？’使者以质对，叹曰：‘宰相器也。’周祖自邺起兵向阙，京城扰乱，质匿民间，物色得之，喜甚，时大雪，解袍衣之”。世宗病危时，又有临终托孤之命。而范质竟投靠了宋太祖，做了不忠之臣，大节不守。像范质这样洁身自好，一生注重品质修养的人，在忠义与屈仕于宋之间不是没有犹豫和痛苦的。降宋之后，范质心情抑郁，大病一场，“俄被疾，太祖征泽潞，幸其第，赐黄金器二百两，银千两，绢两千匹，钱二百万”。矛盾和痛苦是内在的。而最主要是经过长期剑与火的摧折，看惯了王朝的更迭，社会舆论、道德规范中已没有忠与义这条准绳了。所以廉洁自守的范质也只能不自觉地降阶朝拜新主，成了大节有亏“欠世宗一死”的人物。

（二）赵普

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一语足以让赵普名垂青史了。《宋史》本传说赵普本没有学问，后来边工作边学习才成为有学问的人。“普少习吏事，寡学术，及为相，太祖常劝以读书。晚年手不释卷。每归私第，合户启篋，取书读之竟日。及次日临政，处决如流，既薨，家人发篋视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”《湘山野录》载太祖年轻时呼普为“赵学究”。赵普不以学问和文采显胜是事实，但其水平仅止于半部《论语》实带了点夸张。

从广义上讲,“赵学究”是个文人,确切说他是个职业政治家,是个军师,是个大权独揽的宰相,是个精于权术、有情有欲、叱咤风云、有吏才的人物。时代造就人才。在五代动荡的社会里,人们更崇尚的是权力、实力、权变,文人之才也更偏于吏才,这在赵普前辈的身上已很清楚。他的前任宰相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皆以吏才出名,而不是以文才显世。

时代使赵普熟谙的不是诗词和古籍,而是张良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式的雄才大略。军旅和政治生涯使赵普从一个学究变为帝王的军师。“车驾征李筠,命普与吕余庆留京师,普愿扈从,太祖笑曰:‘若胜胄介乎?’”他也曾受到武人的嘲弄,最终却成为一代军师。“普每退朝,不敢更衣冠,一日大雪向夜,普意帝不出,久之,闻叩门声,普亟出,帝立风雪中,普惶惧迎拜。帝曰:‘已约晋王矣。’已而太宗至,设重茵地坐堂中,炽炭烧肉,普妻行酒,帝以嫂呼之。因与普计下太原。普曰:‘太原当西北二面,太原即下,即我独当之,不如姑俟削平诸国,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?’帝笑曰:‘吾意正如此,特试卿尔。’”雪夜火炉,议定国策,堪为佳话。而赵普先南后北的战略构想实高瞻远瞩,功莫大焉。重外在事功,本是儒家的一大人人生目标,只是后世文人专事文辞,才给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印象。太祖一朝,许多重大决策都与赵普有关,诸如强干弱枝、收精兵财赋于中央等。“遂劝帝遣使分诣诸道征丁壮籍名送京师以备守卫,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,由是兵甲精锐,府库充实。”

偏于吏才的文人,受儒家思想侵蚀较浅,传统儒家观念淡薄,更重势利和权术。陈桥兵变,赵普堪为主谋。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一,赵普参与了制造舆论、策反士兵、假造军情、沟通石守信等朝内大臣、黄袍加于赵匡胤身上等一系列活动。赵普与范质相比,吏的成分更多一些,儒士和文人的成分更少一些,心中充满了权术,离“道”更远。所以范质心中尚有一些忠义和君臣伦理的观念,降宋尚心中有愧,赵普则以叛周立宋为功,以开国功臣自居,名节观念无存。

赵普的行为不能不让人想起前相魏仁浦。《宋史》本转载:

乾佑末，隐帝用武帝使李邕等谋，诛大臣李邠、史弘肇等，密诏澶帅李洪义杀骑将王殷，令郭崇害周祖。洪义知事不济，与殷谋，遣副使陈光穗斋诏示周祖。周祖惧，召仁浦入计，且示以诏曰：“朝廷将杀我，我死不惧，独不念麾下将士？”仁浦曰：“侍中握强兵临重镇，有功朝廷，君上信谗，图害忠良，虽欲割心自明，奚可得也，事将奈何。今诏始下，外无知者，莫若易诏以尽诛将士为名，激其怒心，非徒自免，亦可为杨、史雪冤。”周祖纳其言，倒用留守印，易诏书以示诸将。众惧且怒，遂长驱渡河。及即位，以仁浦为枢密副承旨，俄迁右羽林将军，充承旨。

士，本来负着社会道义的重担。五代宋初的文人已失去了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理想和信念，堕落到了“术”的层次，讲究势利，成为势利之徒了。仁浦“幼孤贫，母为假黄缣制暑服，仁浦年十三，叹曰：‘为人子不克供养，乃使慈母求贷以衣我，我能安乎！’因慷慨泣下。辞母诣洛阳，济河沉衣中流，誓曰：‘不贵达，不复渡此。’”虽也慷慨激昂，但其只为一个贵达，缺乏一种为群体、为信念的崇高和悲壮，境界也就低了。

偏于吏才的文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也有一些特点。信仰儒家观念的文人认为君臣之间尚有一个“道”字。而道是天下最高的公理，普天下之人的准则，即使帝王也需尊奉。有道则兴，无道则亡。当道与帝王之势发生冲突时，道尊于势，从道不从君。知君之过，冒死进谏。而持吏道的人，往往过分屈于帝王的威势，不能以道义自律，而自甘为奴，与帝王形成了一种主奴关系。在赵普身上，我们不难看出吏道的影子。赵普之得宠，缘于“宣祖卧疾滁州，普朝夕奉药餌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”^①。侍奉汤药是文人不做的，而赵普却甘愿这样做。

君臣之分，讲究一个“义”字，大臣应以自己的卓行奇节立于

^① 《宋史》本传。

朝，以自己的才华和人格自立。而偏于吏道之人注重感情笼络，献个人之忠，以至于谄媚人主。古之奸臣多属此类。赵普虽不算奸臣，然在君臣关系上却偏于一个“情”字。在周世宗与赵太祖之间，他的感情是偏于赵氏的，这才有主谋叛乱之举，而全无忠于世宗之义。在处理与太祖、太宗的关系上，他也往往以情感的力量来打动君王。《宋史》本传云：当他被疏远时，“自陈预闻太祖、昭宪皇太后顾托之事，辞甚切至。太宗感悟，召见慰谕。俄拜司徒兼侍中，封梁国公”。“帝作诗以饯之，普奉而泣曰：‘陛下赐臣诗，当刻石，与臣朽骨同葬泉下。’帝为之动容。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‘普有功国家，朕昔与游，今齿发衰矣，不容烦以枢务，择善地处之，因诗代以导意。普感激泣下，朕也为之堕泪。’宋琪对曰，‘昨日普至中书，执御诗涕泣，谓臣曰：此生余年，无阶上答，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。臣昨闻普言，今复闻宣谕，君臣始终之分，可谓两全。’”这种以情邀宠的做法，与儒家讲究名节的观念，是有距离和高下之别的。

但是独特的实干家的角色，又使他身上具有许多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长处，比如说善于审时度势、能断大事、以天下为己任、刚毅果决等。这是懦弱文人欠缺和需要完善的。《宋史》本传曰：

普性深沉有岸谷，虽多忌克，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。宋初，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，普刚毅果断，未有其比。尝奏荐某人为某官，太祖不用。普明日复奏其人，亦不用。明日，普又以其人奏，太祖怒，碎裂奏牍掷地，普颜色不变，跪而拾之以归。他日补缀旧纸，复奏如初。太祖乃悟，卒用其人。

体道修身是儒家对士人的基本要求，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在功业的内在保证。离开了体道修身，为政者往往易专权和谋利，最后身败名裂。《宋史》本传称“普为政颇专，廷臣多忌之”。赵普为相时，宰相的权力一度很大。“既拜相，上视如左右手，事无大小，悉咨决焉。是日，普兼监修国史。命薛居正、吕余庆参知政事以副之，不宜制，班在宰相后，不知印，不预奏事，不押班，但奏行制书而已”。后

来,普尝渐专,缘以为私。“时官禁贩秦、陇大木,普权遣亲吏诣市屋材,联巨筏至京师治第,吏因之窃货大木,冒称普市货鬻都下。权三司使赵王比廉得之以闻。太祖大怒,促令追班,将下制逐普,赖王溥奏解之”。“故事,宰相、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,同止庐中;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嵩矩女,即令分异之。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,又营邸店规利”。当一个士人缺乏政治信仰,缺乏崇高信念,缺乏精神追求时,他所关注的只能是物质私欲了。而私欲的膨胀,必然使其政治生命走向终结。没多久,赵普就失宠出为河阳三城节度。

三 入宋文士

就文化而言,五代之际南唐、西蜀较盛于后周。据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九载:“建隆初,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,及平诸国,尽收其图籍,惟蜀、江南为多,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,江南书二万余卷。”入宋文人,也以江南地区为多。五代之际,儒家伦理纲常衰微,异说甚行。“南唐主事佛甚谨,中书舍人全椒张洎,每见辄谈佛法,由是骤有宠。当时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,中书舍人会稽徐铉独否,然绝好鬼神之说”^①。生逢乱世,朝代更迭频繁,人命如草,文人们难免及时行乐,纵情恣欲。“初,南唐主以熙载尽忠能直言,欲用为相,而熙载任情弃礼,妓妾纵恣,南唐主以此难之。俄被劾,左迁右庶子,分司南都。熙载尽斥诸妓,卑车就道,且上表求哀。南唐主喜,留之,寻复其位。已而诸妓稍稍复还,南唐主曰:‘吾亦无如之何矣!’及卒,南唐主叹曰:‘吾终不能得熙载为相也!’乃手书赠熙载平章事。”^②南唐主本人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纵情声色,不留意国事。“南唐主立周氏,故后妹也。美姿容,以姻戚往来,先得幸于唐主。后卒,遂册立之。唐主颇留意声色,霓裳羽衣曲久绝不传,后按谱尽得其声调。唐主常欲以户部侍郎孟拱辰宅赐教坊袁承进,御史张

① 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五。

② 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六。

宪上疏力谏不从。”^①“唐主酷信浮屠法，出禁中金钱，募人为僧。时都下僧及万人，皆仰给县官。唐主退朝，与后服僧衣，诵佛书，拜跪手足成赘。僧有罪，命礼佛而释之。……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。”^②

上有所好，下必有从。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，多纵情文艺，任情弃礼，一旦入赵宋新王朝，必多有不适应。加上以降臣身份出现，更捉襟见肘。下文逐条分析之：

一类是真心背主弃国，投于赵宋的。樊若水可为典型。“樊知古，江南人，举于乡，不获第，因谋北归，献计于朝。以钓竿渔于采石江，凡数年，横长绠量江水之广深。绠既沉，则阴有物波底助起，心知其国之亡。遂权策谒太祖曰：‘可造舟为梁，以济王师，如履坦途。’知古旧名若冰，太祖以其声与弱兵近，故改之。江南平，邦人怨之，累世邱木悉斩焉”^③。就樊若水而言，一如战国策士，心中已无祖国概念，惟纵才施能，游说诸侯，一国不用，则往他国，是比较典型的个人主义者，个性也较偏狭。据《能改斋漫录》载：“樊若冰贫甚，游索乡人不为礼。后北游，建策置浮桥采石，以渡王师。江南平，擢为本路转运使。所仇之家，方开酒场。樊乃于岁除日卖酒最多，按其所入以为额，其家坐是输纳不逮，家遂破焉。”在樊的身上，只能见到权与势，义与礼丧失尽了。

一类是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不得不降者。江南名士徐铉为代表。徐铉曾数度为使，出使赵宋，也颇能为国分忧：

江南主危迫，遣学士承旨徐铉求缓师。铉至，言于帝曰：“李煜无罪，陛下兵出无名，煜以小事大，如子事父，未有过失，奈何见伐？”帝曰：“尔谓父子为两家，可乎？”铉不能对而还。逾月，江南复遣铉乞缓师，以全一邦之命。铉见帝，论辩不已。帝按剑怒曰：“不须多言，江南亦有何罪，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耶？”

①② 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六。

③ 《玉壶清话》。